
明清上海地区市镇信仰与市镇空间发展关系初探

周向频 黄燕妮

提要 明清时期，松江府所辖的上海地区市镇快速兴起和发展，市镇信仰成为推动市镇空间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文章对明清时期上海地区市镇信仰形态与空间、本土信仰活动对市镇格局的发展，以及外来宗教对市镇空间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揭示了本土信仰在明清传统市镇中有其独特的“文化号召力”，它在与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互动中，不仅促进了市镇的形成与空间完善，而且自身的信仰体系也朝着日益世俗化、商业化发展。于此同时，伴随着西方各种宗教的传入以及全国各地人口流入所带来的丰富的信仰文化，上海地区的信仰类型日益多元化，为近代上海五方杂处、高度异质性的“海派宗教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市镇信仰；信仰演变；市镇空间发展；明清上海地区

中图分类号 U98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361/j.upf.201603014

文章编号 1000-3363(2016)03-0113-07

作者简介 周向频，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zhouxpmail@sina.com

黄燕妮，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1 明清时期上海市镇的主要信仰

1.1 上海市镇的本土信仰

上海地区的宗教信仰十分丰富，佛教、道教以及民间信仰是本土信仰的主流，其中佛教最早传入上海，早在三国吴赤乌年间（238年—250年）就已经修建了龙华寺塔和静安寺，到了唐五代和两宋时期上海地区的佛教有了较大发展，当时的商业大镇青龙镇相传就有“七塔十三寺”之说。在整个元、明时期上海地区的禅宗十分活跃，尤其是明代寺院新增了120多所，直到太平天国运动中大量的佛寺建筑遭到破坏，这一发展才逐渐减缓。据统计，从三国时期起到清代止，上海地区曾建造过468所大小寺院（高振农，1990），而且无论是人口比较集中、经济相对发达的市镇，还是人烟稀少，以捕鱼、务农为主的农村地区，都有佛教寺庙的建立。

道教最早传入上海的记载，是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葛玄和葛洪活动的传说。晋安帝隆安五年（401年）孙恩攻打沪渎，天师道始传上海。唐宋以后，上海道教初具规模，元代随着道院制度的完善，逐渐形成了具有上海地区特色的道教文化（丁常云，1994）。清代实行抑制道教的政策，但上海地区兴建的各种宫观、道院以及官祀坛庙，总数也有109所之多（葛壮，1997）。

在上海县境内绝大多数为正一派，只有一所是全真派道观，即著名的“海上白云观”。道家神祠体系在发展中，不断吸纳了民间信仰中的神祇，继明代将城隍神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之后，清代也先后将关帝、刘猛将军、文昌纳入国家祭祀体系当中。

民间信仰在许多市镇祭祀信仰中自成体系，在民间社会中，城隍神是最重要的神灵信仰之一。有学者认为城隍信仰处于“官方信仰与大众信仰的过渡点”（王斯福，2000）。明清时期除了城隍信仰外，上海各市镇中信仰对象非常庞杂，其中主要的信仰对象包括关帝、三官、施相公、杨老爷、刘猛将、李王、总管等等。根据信仰需求、信仰群体以及社会时势发展的不同，有不同的对象和相应的职能。例如，“总管”信仰是保护漕运的神灵；以南宋抗金名将刘铸为原型的刘猛将信仰，主要职能是抵御蝗灾；天后（也称“妈祖”）信仰是以海神为主要祭祀对象，由闽粤商人带入上海；而黄道婆则是明清时期松江一带纺织行业的守护神。此外，在广大农村地区，以土地神为祭祀对象的土地庙是乡村中的信仰中心，它与镇中心庙形成上位庙和下位庙的阶层关系。

1.2 外来宗教信仰

明清时期，除了上述的主流信仰之外，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也成为了具有代表性的传入上海地区的外来宗教。

伊斯兰教在宋、元之交传入上海地区，自元朝开始，来自阿拉伯、波斯、中亚和我国西部地区的穆斯林，通过军士驻扎、商贸以及与通婚等多种途径，进入上海，并最终停留繁衍下来。明朝末年，在上海县的七宝、诸翟等地，出现了回回坟，原来大多从松江和青浦迁徙到七宝镇的穆斯林群众，还在镇上的南街王家场建起一座清真寺，但从整体上说伊斯兰教的传播相对缓慢。

天主教传入上海地区是在明万历年间，出身上海的大学士徐光启接受天主信仰，他和他的后人推动了天主教在上海地区的传播。此外，北京做官的嘉定人孙元化于1621年在北京受洗，并邀请传教士在其故乡“开教”，建造教堂。正是依靠这些的官宦与大户家族，天主教在上海地区站住了脚跟。及至康熙初年，上海县有教徒约4万人，松江县2千人，嘉定县4百人（阮仁泽，1992）。

基督教新教信仰是在清末开埠之后传入上海，以英美为主的各个教团纷纷在此开辟教堂、设立医院、学校，为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还有包括东正教、犹太教的其他宗教，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在上海地区，但影响力都不及新教。

2 本土信仰与市镇空间发展

2.1 信仰文化推动下的市镇的发轫

在早期市镇形成中，上海一些地方出现了“因寺兴镇”、“寺镇互构”的市镇格局，寺庙作为市镇的主导和核心，市镇空间围绕寺院周围逐步建设起来。据现有的地方志记载，许多传统市镇都因寺庙得名，例如法华镇、龙华镇、七宝镇，真如镇、南翔镇等等。七宝镇就有“镇无旧名，缘寺得名，寺无他重，因镇推重”的说法。这些市镇中，有的是在寺院的吸引力下，最初的聚落集市聚点发生了偏移，开始以寺庙为核心发展起来新的市镇中心，并不断完善形成地区的中心市镇，例如南翔、真如、江湾镇；有的是在市镇出现之前就有了寺庙，寺院作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和区域性的文化中心，成为当时民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进而带来了人气，的旺盛，激发了集市发展，形成了寺镇互构的局面，例如龙华镇、七宝镇、法华镇等。可见，兴盛的佛教信仰成为了上海地区市镇集结重要的路径，市镇信仰与市镇经济齐头并进，共同推动了市镇的发展和繁荣。

2.2 信仰空间与市镇结构的发展

在市镇空间中，由于水网纵横以及受土地利用的限制，并没有类似于西方城镇广场的，具有一定面积的公共空间。寺庙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人们聚集的场所，寺庙所举行的各种祭祀典礼、信仰崇拜成为群众性的日常文化生活。而寺庙前的庙桥区段作为进入寺院的必经之路，流量大，成为最佳商业活动地点，因此，最初的商业集市就出现在庙桥头以及通往庙桥的道路两侧，随着市镇建设拓展，集市不断延伸形成市河、市街。以寺庙、桥、集市为核心的市镇开放空间序列成为了市镇的核心空间，庙宇和集市也成为市镇空间不断向外拓展的动力，这一点从桥的修建上就能看出来。

以七宝镇为例，七宝镇是上海地区一个重要的水陆码头以及棉纺织业大镇。七宝镇最繁华的区域是连接七宝教寺和东岳行祠的南北大街，七宝镇的次一级的街弄，大都从南北大街分岔出去。位于镇北面的七宝教寺在当地寺观丛林中首屈一指，香火旺盛。元代修建了东、中、西三座香花桥，中香花桥直接和七宝教寺山门相连，从而带动了寺庙前的北大街商业的繁盛。到了明代，镇南面城隍庙的祭祀活动日益频繁，在主要的水系横沥上陆续修建桥梁，从此沟通了南北大街，带动了整个市镇的发展。明清时期，七宝镇逐渐形成了七宝教寺、中香花桥、北大街、浦汇塘桥、南大街、南城隍庙的市镇开放空间序列，成为了七宝镇商业中心和宗教文化中心（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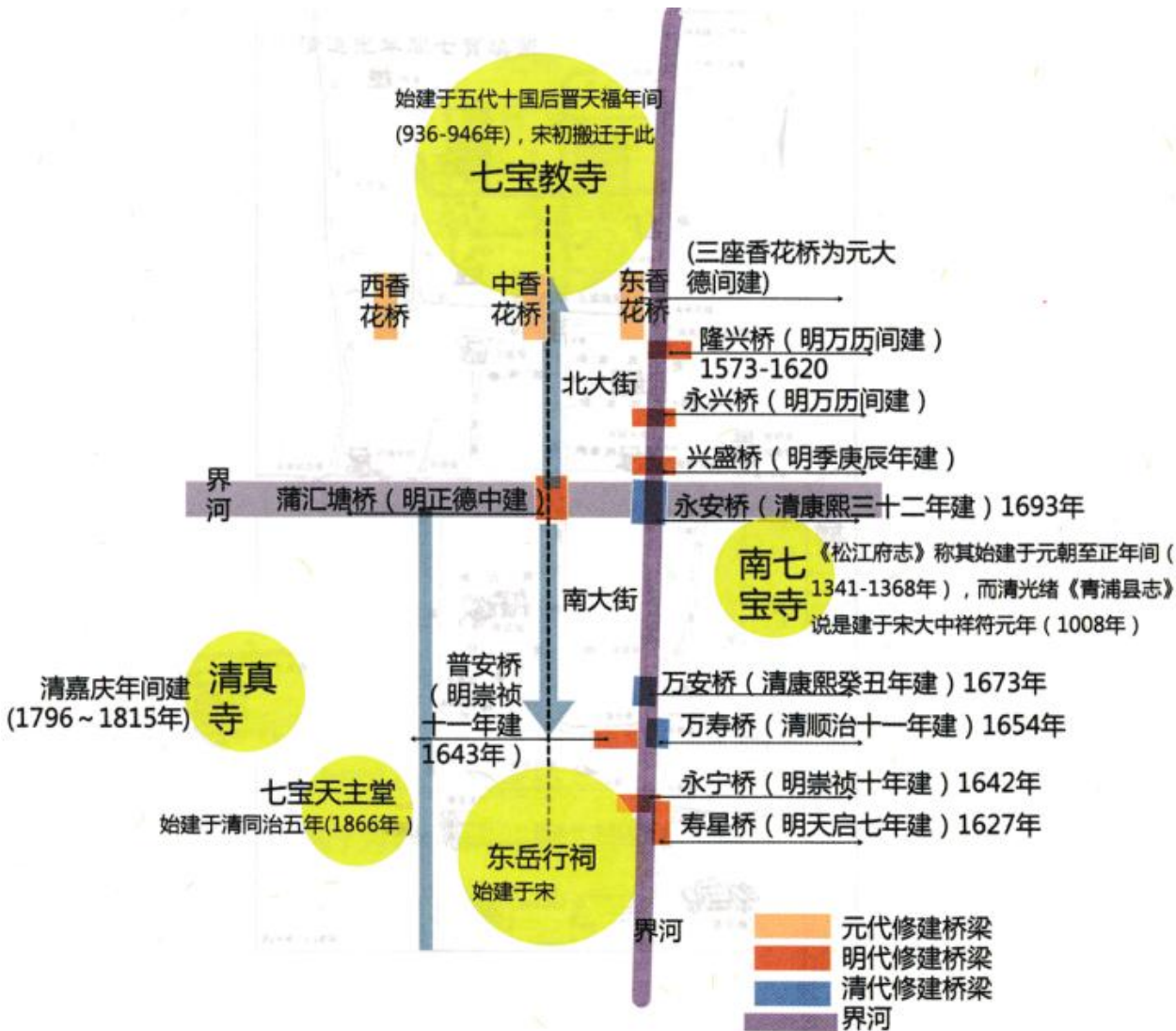


图1 明清时期七宝市镇结构演化图

Fig.1 The evolution of Qibao city structure in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ies
资料来源：根据清道光年间七宝镇图以及《蒲溪小志》中“桥梁”记载绘制。

在诸如七宝镇这类的市镇实体空间塑造中所出现的“以庙兴市”现象，表明寺庙的核心地位得到了附近居民的认同，在寺庙的带动下，街市、店铺、民居，以及官署、园林、宗祠学校等公共设施日趋完善，市镇建设的逻辑过程和形成机制与市镇的经济活动并行展开，其关键因素就在寺院本身的文化影响力。

2.3 信仰空间与周边环境的演变

宗教空间的自身演化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会对周边空间的发展起到促进或者制约作用。在宗教空间的演化历程中，经济因素的推动，使得寺庙等宗教空间发展日趋世俗化。明中叶以后，由于市镇商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推动了拥有地方城市保护神象征的城隍信仰的普及，“以市兴庙”的建设行为也屡见不鲜。尤其到了清代，各市镇的宗教寺庙在与周边商业、住宅争取发展空间的博弈中呈现出不同的局面。

以上海县的城隍庙为代表，其庙园空间的演化，呈现出庙园逐渐融入整体的城市街区开发的过程中。上海的城隍庙原名金山庙，明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知县张守约将金山庙改建为城隍庙，此后地基不断扩大，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于城隍庙东侧造起的东园，面积2.2亩，内有山石池沼、厅堂楼台，具有宗教娱神与道场的作用。乾隆年间，上海士绅集资从潘氏后裔手中购得豫园，使之成为城隍庙的庙园，曾经一度更名为“西园”。豫园从明代的私家园林逐渐演化成清代的寺庙附属公共园林，在庄严肃穆的庙宇宗教场所周围环绕趣味丰富的游憩场所和园林休闲空间，戏院、茶馆、酒楼、会馆，鳞次栉比、日益勃兴。

豫园的空间蜕变与上海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明末清初，正是上海各种会馆、行业公所、小商品和纺织行业快速发展和壮大时期，老城厢中心的豫园作为市镇最活跃的文化中心和人流聚集地，成为了这此机构发展的首选。西园修整后，园内已经出现了集市，大多数厅舍均已被辟做商业议事公所。在此期间还有二十余个行业在西园设立公所，有几家保存了西园园景，有的重建厅堂，只留下一部分山石池沼。每逢清明、中元、十月初的“三巡会”，城隍神出巡，远近商贩云集，摊点林立，官民参与，百戏杂呈，形成场面宏大的庙会。还有梅花会、兰花会及菊花会等岁时雅集，文人名流聚集于此，评点花魁。城隍庙地区逐渐形成了“以节引客”的传统习俗，许多原本赶庙会的“行商”逐渐“沉积”了下来，成为“坐商”，形成了一个繁华的商业区。从整体发展而言，城隍庙宇，豫园公共园林结合周边的商业店铺以及住宅共同构建了一个当时的以庙、园、市、居为一体的繁华的市镇中心。豫园、城隍庙地段不断呈现出集宗教活动、园林游憩、商业购物、娱乐活动为代表的近代城市综合体的雏形。

此外，寺庙空间演化的另一种类型，则是宗教空间消解并让位于市镇商业空间的发展。以位于青浦金泽镇的著名古寺颐浩禅寺为代表。颐浩禅寺始建于南宋景定年间，里人费辅之以颐浩故居创立经堂，明代寺庙规模进入鼎盛时期，明洪武年间周边已有五老峰，枯树峰，金鲫池等十大景点。

从乾隆时期的具体的空间布局来看，颐浩寺位于金泽塘东侧，有寺洪环绕在寺庙的南东北三面，成为天然的界线。镇区主要道路的上下塘街沿金泽塘延伸，并有三条支路自颐浩寺前大街通往颐浩寺内。颐浩禅寺坐拥宽阔的滨水界面，在跨金泽塘东西向的六座桥梁中，仅颐浩寺面金泽塘的西侧即有三座，显然寺庙成为整个市镇的中心。此后，随着寺庙因火灾等各种原因的毁坏以及市镇商业的发展，寺庙空间逐渐被侵占，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重修之前，颐浩寺内在主建筑群以外分裂成东、南、西、北四院，主要建筑退到民居之后，寺庙周围商业及民居空间沿着市河不断密集起来。到了民国初期时期，根据居民对颐浩寺的回忆，寺庙面向金泽塘的开放界面已经极度萎缩，置身于沿河密集的民居之后，内部院落层次缩减，完整的“山门一街亭一金刚殿一大雄宝殿”的格局让位于密集的民居店铺，自民国时期至今，仪式空间仅存大雄宝殿前的广场（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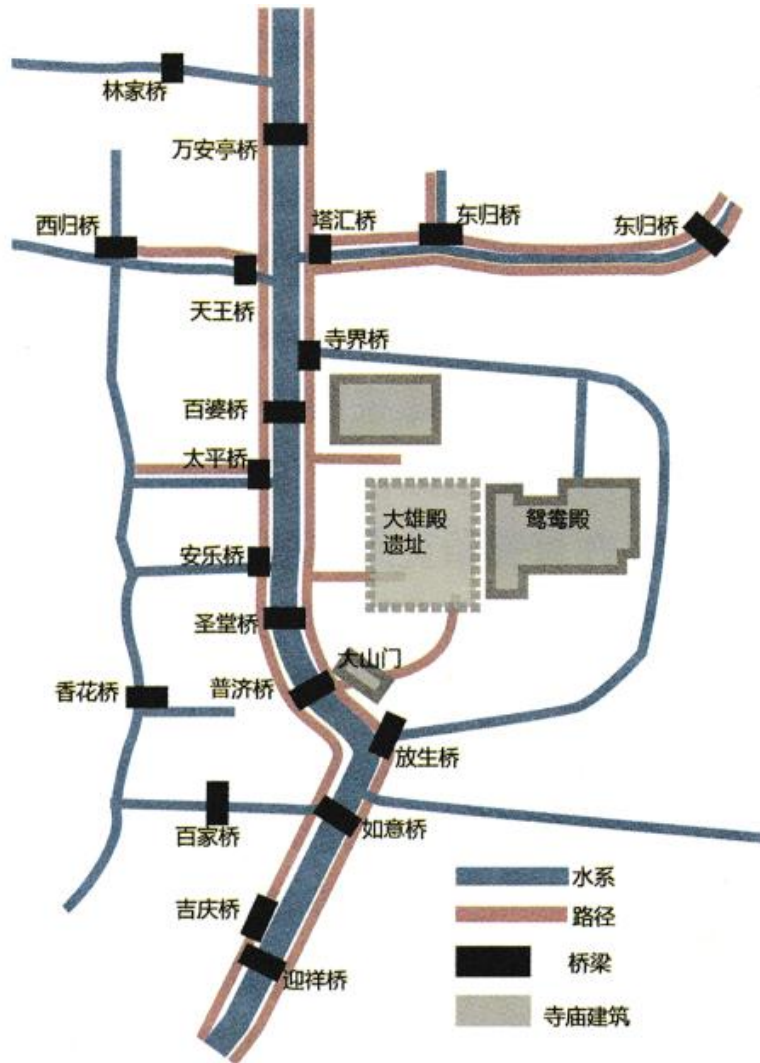


图2 清乾隆年间金泽镇颐浩禅寺及周边环境图

Fig.2 Yihao Temple in Jinze Town and its surroundings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Qing dynasty

资料来源：根据清乾隆年间金泽镇图绘制。

从宗教空间在发展中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命运”，可以看出上海地区市镇聚落发展的根本因素在于经济活动的推动，商业的发展主导并影响着公共市民文化，也带来了信仰本体演变中对神灵空间的人性化、世俗化建设，最终带来寺庙空间融入市镇的整体开发之中，形成不同的格局。

2.4 信仰空间分布与市镇格局构成

从信仰空间的分布来看，中国传统的城市建设对祭祀建筑的方位布局，都有明确的礼仪制度，作为府县这一类型的行政中心，据《明史·礼志》中的记载，例如社稷坛应设于城西北，厉坛应位于城北，山川坛应设于城南（成一农，2001），这种对礼仪制度的重视，反映出以传统儒家为主导的国家权力对社会制度及文化思想的控制。而明清时期，随着市镇中大肆兴建宗教建筑，市镇中魔方府县出现不同类型的祭祀空间，主要以寺庙、宗祠、庵堂、亭塔等四种类型为主，在上海的市镇中，由

于水路纵横、空间有限，宗教建筑方位设置、空间分布依据市镇空间走向显得更为灵活多变。

第一类是交大的佛寺、城隍庙等。作为市镇的典型化、代表性宗教空间，常常以建筑群的形式出现，一般位于市河、市街等比较重要的位置上，依据市镇不同的空间结构，分布有所差异，例如娄塘镇和朱家角镇等“人字形”市镇结构，主要的寺庙空间分布在水系的交叉点上。南翔镇为典型的“十字型”空间结构，云翔寺位于市河的十字型交叉处，与大德寺、万安寺、共同占据了重要的市河空间。安亭镇的主要祭祀空间则分布在“丁字形”市河水系旁。由此看出，市镇中主要祭祀建筑与市河、市街构成了市镇空间的结构性骨架以及市镇的开放空间序列（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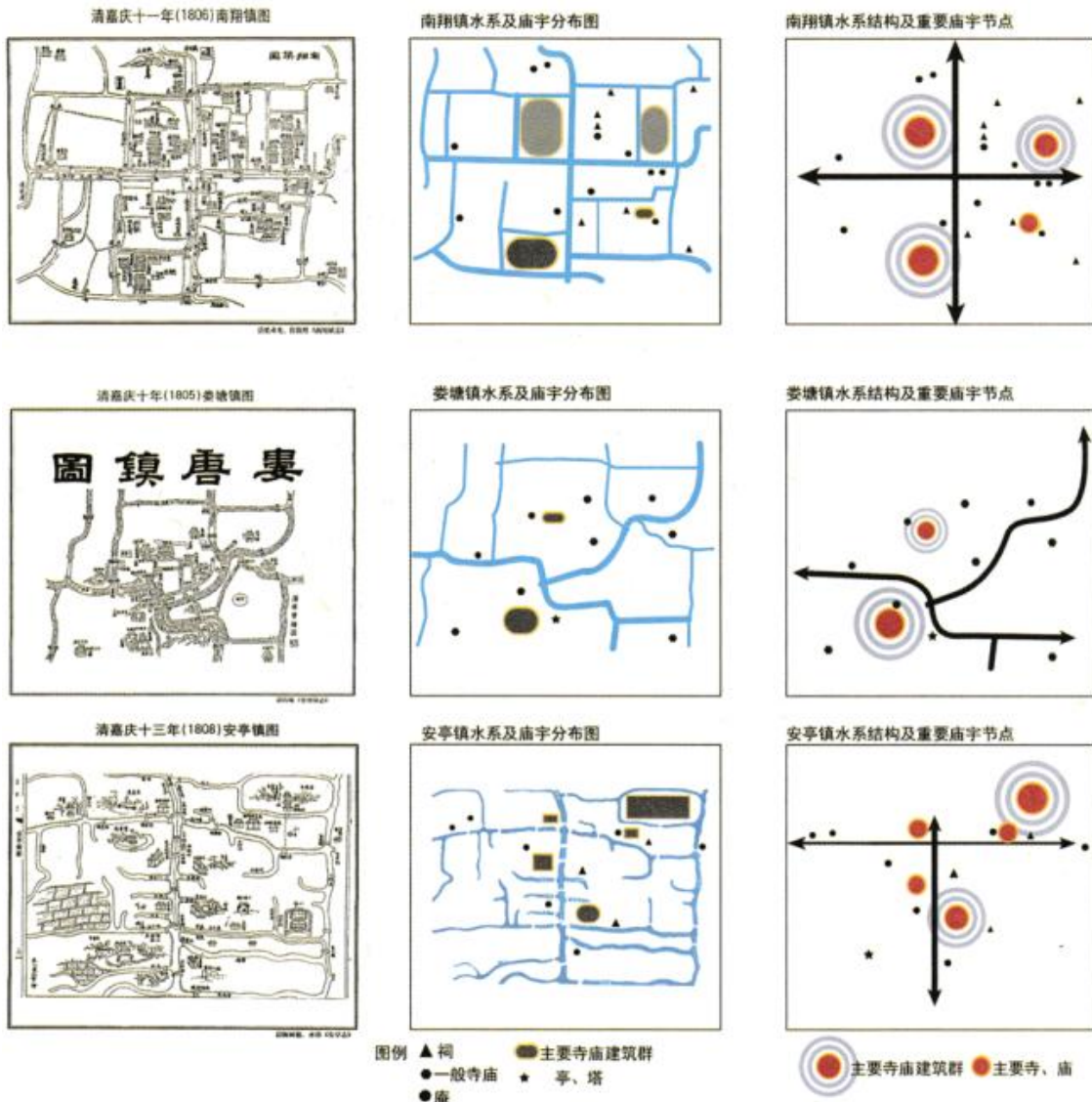


图3 清市镇信仰空间与市镇格局图

Fig3 Belief spaces and the pattern of town in the Qing dynasty

资料来源：根据清嘉庆年间市镇地图绘制。

第二类为普通祠庙，祠是为纪念伟人名士而修建的供舍，例如上海市镇中常见的孝子祠、杜公祠、二陆祠等等，此外还有大户人家的祖先祠堂，例如潘祠、罗祠等等，这类祠堂主要与市镇居住空间相结合散布在各处。庙宇中常见的有土地庙、财神庙、火神庙，有的修建于城隍庙内，有的单独设置在市井街巷中。

第三类为庵堂。“庵”指的是佛教女子出家行佛事的地方，观音堂，佛庵等是佛教或道教的宗教活动场所。庵在市镇分布较灵活，有坐落在市镇中心的尼庵，例如光绪年间修建的南汇泥城镇净心庵，还有位于市镇街巷中的尼庵，例如修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位于提篮桥附近的下海庙，建造初期寺庙周围有大量渔村，庙庵主要是渔民祈福平安、奉祀海神的地方，清嘉庆年间改为尼庵。

第四类为亭、塔。一般的亭、塔依托寺观祠庙而建，起到点缀寺庙园林风景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亭作为单独的风景建筑，常常建在郊外，带有歌颂皇恩意味。例如位于青浦北门外的皇华亭是驻节迎诏之所，具有迎接皇权使节的功能。单独的塔，在上海地区更具有保驾护航的独特寓意，例如雁塔始建于唐乾符年间，位于黄浦江上游浏河的小岛上，有导航引渡的功能。

2.5 信仰活动与市镇空间格局

与丰富的信仰空间相对应的是上海地区的民间祭祀、结社以及庙会活动的兴盛，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每年三月的城隍祭祀、东岳诞辰，五月的关帝生日，八月中秋节。在江南地区的许多市镇的祭祀节庆活动中存在“解钱粮”的现象，而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上海地区的市镇信仰活动中。这种习俗是以东岳神与城隍神作为市镇祭祀的主要神灵，当县或镇的特定庙宇举行庙会时，乡村庙宇赶往参拜并象征性地交纳阴间使用的纸钱，解钱粮的习俗亦是在模拟人间官府的征收钱粮的行为（滨岛敦俊，沈中琦，1991）。其中东岳神的地位最高，次级镇城隍以及其他中心庙宇会给东岳神交纳解钱粮，再次级的村土地神都会向东岳神和镇城隍上贡。例如，光绪《罗店镇志》卷之一《疆里志上·建置·节序》记载“三月二十八日东岳诞……有玉皇好事者先于正月九日上天表，届期各庙界土地司神赛会，以纸箱藏褚帛纳诸宫前，堆积如山，名曰解天迎诸神圃走，又谓验褚”。

由此可见，上海地区从县府到市镇乃至乡村，形成一个个以庙宇为中心的大大小的祭祀圈。市镇是以城隍、关帝等主要寺庙为中心形成镇域范围的祭祀圈，乡村以土地庙为中心形成村落祭祀圈。作为虔诚的香客，每当节庆来临之际，都会先去祭拜县城隍、然后逐级祭拜镇城隍、村庙，其行为显示信仰圈里的不同层级神灵，在群众心中的地位以及信仰体系的内在结构。借助于信仰，使得国家权力深入到社会的基层，而这种文化现象所体现的社会秩序，也表明中心市镇和周边村庄的社会共同体的关系，市镇与四围“乡脚”形成中心地结构。有学者研究表明传统江南水乡市镇以各级市场为纽带形成不同的“市场共同体”^①，同样以各种信仰为牵头的祭祀活动恰恰构成了基层社会管理、运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市镇中，信仰中心往往也是经济和社会中心，信仰行为则自然而然地成为该地方社会聚合的标识。

3 外来宗教对市镇空间的影响

3.1 外来宗教空间的嵌入路径

在进入上海的外来宗教中，天主教的布道方式使得其传播更为广泛。清康熙四年上海地区已有教徒四五万人（孙金富，2001）。虽然清雍正年间采取了禁教政策，但由于江南密布的河网易于躲避官府的追捕，因而即使在禁教的严厉时期，也有外国传教士在上海及其周围偏远的市镇和乡村活动。由于失去公开身份的传教士在乡村农户或渔船里举行宗教活动相对容易，因此首先接受信仰的大多数是农民、渔夫和船夫等社会底层市民。据耶稣会士的统计，1644年—1701年期间上海县城有教堂3座，乡下有66座（程佳伟，2010）。

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作为各种类型的宗教团体竞相争取的地区，城区中心建造起大量包括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在内的不同宗教空间，形成了高度异质性的文化景观。据上海县志记载，“邑城三面环水，东北虹口出宝山界距吴淞口不过三十六里一潮可达，故论险要必以吴淞口为关键……一徒嘉邑南翔镇，邑境栅桥为吴淞江北路；一徒青邑七宝镇至邑境虹桥为浦汇塘中路；而其南路徒江浙交界之金山卫城拓林、青村、南汇、川沙直抵吴淞口，迢迢二百余里，沿塘走马，其疾如风，不旬日间连陷金奉南川四城邑境……”（应宝时，1871）。基督教各派在初期进入上海建立布道船，大多沿着这三条路径在城内以及各渡口分布，因此沿着重要的交通水道、形成三条信仰传播路径。正是因为水路的便利，教堂往往是分布在水路沿线

的港口码头以及中心市镇的滨水空间。以天主教为例，开埠初期，天主教将建在码头附近的董家渡教堂设为教区总堂，而其他市镇主要的天主教堂几乎都分布在通往县城的三条主要水道上，总堂与市镇、乡村的分堂共同构建了天主教的信仰网络(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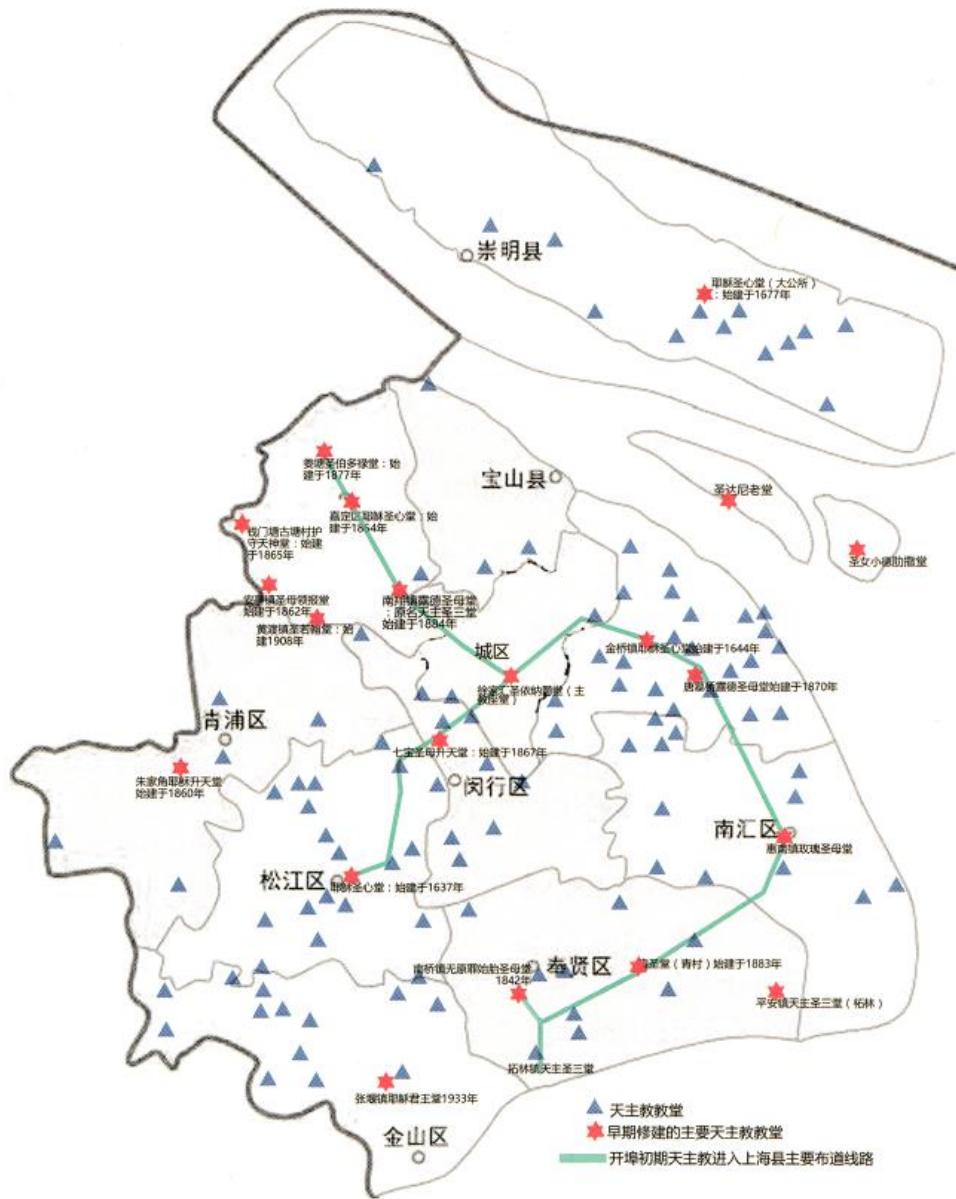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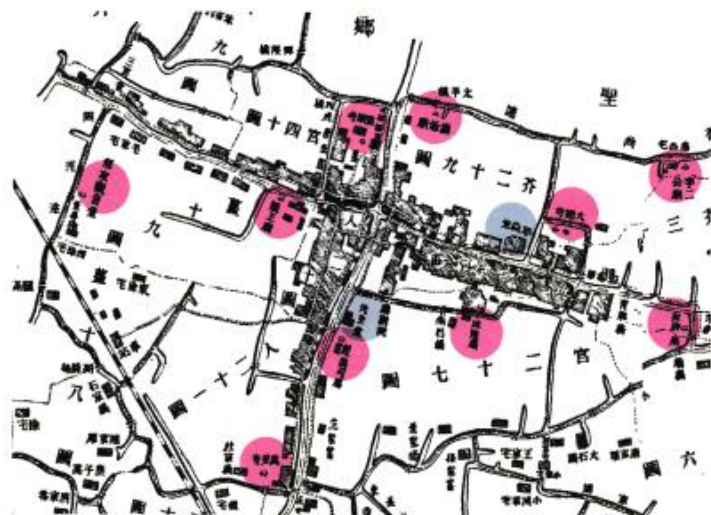


图4 明清上海市镇天主教堂分布及主要布道路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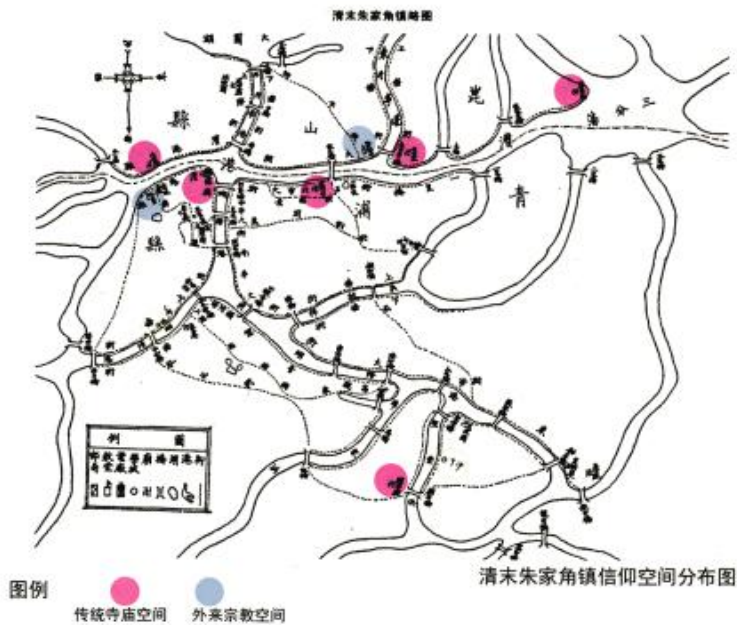
Fig.4 Catholic Church distribution and the main routes in Shanghai in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ies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宗教史中关于天主教堂修建以及清《上海县志》中主要水路而绘制。

3.2 多形态下的市镇空间表征

伴随着外来宗教的传播，在水乡市镇的市河两岸，出现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宗教空间并置在滨水两岸，形成多样文化信仰并置。例如始建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南翔天主堂(又名“露德圣母堂”)位于上搓浦旁，新教“耶稣堂”位于走马塘旁靠近大德寺，两座教堂占据十字形水系的主要位置，与众多本土寺庙建筑矗立在河岸边。又如朱家角镇建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的天主教“耶稣升天堂”位于漕港滨水旁，与圆津禅院，慈门寺比肩而立(图5)。



民国初年南翔镇信仰空间分布图



清末朱家角镇信仰空间分布图

图5 清末市镇滨水信仰空间分布图

Fig.5 Distribution of belief spaces in waterfront areas in the town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资料来源：根据两镇县志中地图所描绘的宗教空间绘制。

在上海地区的众多的市镇中，七宝镇由于经济繁荣，文化昌明，宗教活动兴盛，曾经出现过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内的五教共存的情况。在全国县级或县市级的城镇极为少见。最早的七宝教寺和东岳行祠是佛教丛林和道观的代表，这两座建筑群带动了古镇空间结构沿着南北纵向发展，明代七宝的王家场地区修建了伊斯兰教清真寺，是当时松江府回民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建于清同治年间的七宝天主教堂延续至今，保存完好。

虽然外来的宗教信仰空间并未对市镇空间结构带来根本改变，但是其独特的宗教建筑艺术风格，却给传统的江南市镇空间带来多样化的景观风貌。这些不同宗教信仰空间的并置，一方面体现了经济社会发达的上海地区市镇的包容度以及文化的多元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外来宗教进入上海之后的适应性同化，从而更有利于信仰文化传播的特征。

4 信仰文化与市镇发展的综合因素

明清上海市镇的发展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市镇经济是发展的内核，社会人口及组织结构是发展的纽带，信仰文化在与经济和社会结构、人口的互动和相互影响中，带来信仰本身转化并推动市镇的发展。

首先，从传统宗教文化自身的发展流变角度看，在整个江南地区的宗教文化的演化过程中，本土信仰在儒、佛、道教理的相互融合中从正统的伦理教化和神圣地位逐渐走进市民阶层，明中期之后传统信仰显得越来越具有功利性、实用性，内容更平民化和世俗化。上海因为地缘关系一方面地受到最发达的江南文化的辐射，宗教文化融入整体江南地区发展脉流中；另一方面，上海作为远离当时苏浙为政治中心的边缘地带，成为当时外来文化纷纷涉足的“处女地”。19世纪中叶之后，上海地区的信仰文化开始逐渐走向多元化，传统信仰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相互碰撞中出现了文化适应性的同化和异化，这一点从外来宗教语言的本地化以及信仰习俗一定程度的相互接纳能够看出。直到20世纪初的上海，迎来了文化高度繁荣和异质化时期，各种信奉对象千差万别、宗教空间千姿百态、敬拜仪式五花八门、节庆活动频繁庞杂，除了传统的佛教、道教的各种法会、庙会庆典，伊斯兰教的六大信仰、五大功修，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的圣诞节、复活节、感恩节活动，犹太教的逾越节、五旬节也进入了市民信仰生活之中，除此之外，犹太教、东正教、祆教、锡克教、理教也颇有受众，再加之全国各地人口的聚集所带来的本地乡俗信仰，上海成为一座宗教博览园。有学者形容上海的文化是“四不像”即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无所可而又无所不可（熊月之，2008），反映在宗教信仰上可谓是光怪陆离，门类磅礴而繁杂，充分体现了从传统江南文化抽离出来的上海大都市“海派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独树一帜的特点。

其次，从经济社会与宗教信仰的互动来看，明代之后，在江南的农村地区开始采用商品化程度更高的棉、桑来取代稻的种植，种植结构调整使得江南地区的专业化生产和分工更高。当时的松江府迅速成为全国棉纺织业中心，松江的布“衣被天下”，名噪一时，上海地区的农村几乎家家从事纺织工艺。在信仰上，黄道婆信仰成为明清松沪地区流行的民间信仰之一。在整个纺织行业里，人们尊她为“先棉”，并建祠、祭祀，祈求得到庇佑，这种新的信仰对象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社会经济方式的转变。此外，经济结构的调整的另一个表现是以商品交换和生产为中心的市镇繁荣发展，从明中期到清末松江地区的市镇从59个增加到369个（樊树志，2005），此时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涌入市镇从事非农工作，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地区大量的难民、地主大户进入上海地区，使得原本以宗族血缘关系为依托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商人、地方乡绅往往构成了市镇社会管理的领导力量，他们以义举、善举等活动为媒介，实现市镇内部的社会团结和稳定。而当时的城隍几乎成为了市镇的守护神，“以庙兴市”、“以市兴庙”使得寺庙周围成为市镇的经济文化中心，宗教活动的日益商业化和亲民化，带来商业繁荣从而推动市镇空间的完善，从这一些列的连锁效应，不难看出市镇内部自发的建构起经济—社会—文化的实体聚落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本身实现了市镇内部的经济、社会、文化要素整合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共扼发展。

5 结语

明清时期，上海市镇内部自发地完成了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的整合。以江南富庶的农业资源为基底，依托发达的水网体系，在各个市镇之间、市镇与乡村之间，形成了连接紧密的市场共同体、相互依存的社会共同体以及相互影响的信仰共同体，三者相互促进、彼此联动，使得各要素自身的结构和形态也发生了演化。传统本土信仰作为明清时期最主要的文化传统和思想体系，有其强大的文化号召力，在推动上海地区市镇的形、布局，市镇开放空间结构的发展以及区域空间的完善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此外，外来的宗教体系也极大地丰富了明清上海市镇的空间。而明清上海地区市镇以农业向商品贸易发展为主体的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市镇外来人口的不断激增带来的多种文化的交汇，使得上海地区的文化本体开始呈现“去中心化”、“离散化”的特征。太平天国战争以及上海开埠等契机，也因缘际会地推动了上海地区经济社会的变革，并最终导致了上海地区五方杂处、海纳百川的文化格局及信仰格局的形成与演变。

注释

① “市场共同体”在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的基层市场共同体理论中，他认为“市场共同体”是中国乡村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的基本结构范式，基本结构单元应该是以基层集镇为中心，包括大约 18 个村庄在内、具有正六边形结构的基层市场共同体。详见：施坚雅.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 史建云，徐秀丽，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 [1] 高振农. 上海佛教发展的特点 [J].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J] 1990(1) : 112 — 121 .
- [2] 丁常云. 上海道教及其道观文化 [J]. 世界宗教研究, 1994 (3) : 106 — 113 .
- [3] 葛壮. 上海地区宗教文化历史钩沉 [J].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97 (2) : 150 — 158 .
- [4] 王斯福. 学宫与城隍 [M] //施坚雅.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叶光庭, 等,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 [5] 阮仁泽. 上海宗教史[M]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
- [6] 成一农. 中国古代方志在城市形态研究中的价值 [J]. 中国地方志, 2001 (51) : 137 — 141 .
- [7] 滨岛敦俊, 沈中琦. 明清江南城隍考— 商品经济的发达与农民信仰 [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1 (1) : 39 — 48 + 1 (1) 8 .
- [8] 孙金富. 上海宗教志 [M] .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 001 .
- [9] 程佳伟. 上海基督教传教时空演进初探(1608 — 1912 年) [D]. 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
- [10] 应宝时. 清同治《上海县志》卷一《形胜》 [M] . 吴门泉署, 1 871 .
- [11] 熊月之. 论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异质性 [J]. 中国名城, 2 008 (1) : 1 : — 20+ 43 .
- [12] 樊树志. 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 [M] .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